

知识分子图书馆

文化研究访谈录

谢少波 王逢振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T11-53

知识分子图书馆

文化研究访谈录

谢少波

王逢振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访谈录/谢少波, 王逢振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3842-7

I. 文… II. ①谢…②王… III. 文化—研究—世界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659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

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 1989 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 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 1996 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 60 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

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

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

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

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前 言

从最近各种文化政治、思想情绪和社会历史现象来看，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二律背反和悖论。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人人似乎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资本的宏大叙事。马克思 150 年以前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整个地区和整个居民又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世界看来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世界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革命感到厌倦和恐惧。人们声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意识形态又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为后现代时期的精神和基调的差异和区别，三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赞扬，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差异，通过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像、动机、欲望和趣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摆脱帝国主义，然而今天帝国主义却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各种族裔的、种族的、文化的边缘群体在批判和消解西方霸权中正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阵营，但是西方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一方面，非西方的批评家正在否定西方的现在性和现代化的准则；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根据经济发展论和工具理性来评价现代化的程度。这种反讽性的二律背反还可以列下去。但它们都表明了这样一点：对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揭露和抨

击，结果总是以忽视另一种统治和压迫而告终。激进的帝国主义的批评家常常被指责为文化的、美学的、社会的或知识的帝国主义。反基础论正在变成当代进步政治的口头语，而本质论仍然是每一个批评群体的有力的基本思想战略。差异政治常常只是身份政治的别名。正是这些难以处理的反讽和悖论的交织存在，促使我们提出了本书中的 33 个问题，然后请北美 12 位著名批评家对它们进行回答。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两位采访者深感焦虑的一种征象：他们急于想解决当前文化研究中正在讨论的某些难题。

本书的目的旨在介入对一系列主题的讨论，如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以及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并期望在读者当中激起更多的反应和讨论。我们提出这个访谈计划，乃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及学生经常觉得这些概念和问题复杂而容易混淆。例如，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囚牢”？除了意识形态难道没有知识和真理？根据什么标准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比另一种意识形态更优越或者对历史更真实？虽然从过去到现在、从旧到新每一个国家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虽然每一个国家对现代性的意义有其自己独特的解释，但为什么现代性总是根据西方的历史来加以限定？是什么使批评家以不同的方式构想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进程？全球化的支持者赞扬它是现代性的充满活力的形式，可以导致普遍的繁荣、进步和民主，以及情感、想像和主体性的新的构成。全球化的反对者相信，源于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并由之持续的全球化以西方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莱坞电影、计算机技术和美国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运作，使先前的第三和第二世界服从于第一世界的统治。这种对同一历史现象大相径庭的看法如何能得到最好的说明？在金融资本时期大学的作用是

什么？如果大学曾是思想和知识的一个自治的空间，一个不受资本直接影响的自由教育的空间，那么当大学加入公司和商业或者以赢利为目的时，这种自治如何能得到保持？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才设想了这个访谈计划。正如读者会看到的，被采访者的回应对所提的大部分问题作出了有启示的回答，澄清了许多相关的论点，在许多问题上启发了我们，并促使我们修正我们以前的某些观点。

这一讨论集的访谈形式提供一个宽泛的、结构比较松散但更具包容性的论坛，以便于文化研究批评家和理论家进行对话和交流。它有利于被采访者摆脱学术著作的种种约束，更直率、更简明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本书的对话特点在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立场。虽然参与者并未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但他们对一些相同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他们中间形成了某种潜在意义上的争论。例如，在谈及新出现的文化研究话语的始源和性质时，特丽萨·埃伯特、理查德·特迪曼和海登·怀特便形成一种颇有启示的争论。按照埃伯特的看法，文化研究是一种向保守主义投降的行为，因而是一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她论证说，为了产生社会改革的效果，文化研究必须揭露积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运作进行持续的、具体的理论分析。”显然，根据埃伯特的判断，西方文化研究一直在做的并非如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她考虑一切文化问题的真正核心。她认为文化研究不够充分的原因在于它回避了阶级问题，而阶级仍然是历史力量的惟一所在。她继续论证说，“性、性别或种族并不是独立自治的空间。”“在一个资本无处不在的世界上，惟一的历史力量是另一种资本——雇佣劳动者”。海登·怀特虽然并不否认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分析的一种否定，但他认为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代，标志着美国和英国左派知

识分子的一种觉醒，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意识可能出现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若要重新成为社会和文化分析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就必须对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怀特论证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明资本主义何以能解决它的危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被压迫阶级和群体好像并不想改变他们被压迫的状况。与之相反，理查德·特迪曼将文化研究置于启蒙运动的批评传统，认为它是“对我们的批评实践的最真实的批判”。由于确认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承认一切生命和社会及表现实践都应该受到尊重，所以特迪曼进一步认为，文化研究拯救、承认并赞扬先前被边缘化、被压制的经验和文化表征。

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同样各不相同。按照芭芭拉·弗莱和特丽萨·埃伯特的看法，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之中。因为存在着对现实的真实再现。弗莱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不能归纳为意识形态，因为它可以对历史事实提供客观的判断和有效的抵制。正如埃伯特所评论的，把劳动—资本的关系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再现是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对这种错误再现的揭露则不是意识形态。在这些定义中，意识形态似乎仍然是伪意识的一个同义词；与此相似，阿里夫·德里克和布鲁斯·罗宾斯也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伪意识。罗宾斯认为，如果意识形态与伪意识分离，那么它最终只能变成文化本身的同义词。德里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坚持区分真理和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置于伪意识的地位。约翰·卡洛斯·罗对真理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看法表示怀疑，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意识形态总是对人们真实生存条件的“某种形式的神秘化或欺骗”。但是，他这种把意识形态视为无处不在的、不可回避的阿尔都塞式的观念，似乎否认了意识形态之外的知识的可能性。罗认为必须在好的和坏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区

分。而詹姆逊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似乎从根本上使读者离开了这些批评家的意见。他不仅对意识形态作为伪意识和意识形态作为群体理论进行了区分，而且重写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其方式是意识形态既无处不在同时又保持中立，因为意识形态是“群体行为所依据的理论并确证群体的行为”。按照詹姆逊的理论阐述，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现实进行认知测绘的同义词。关于意识形态作为对不可再现的历史进行认知测绘的观念，怀特表示同意，但他不同意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观，不同意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高于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怀特认为，我们可以用来判断不同意识形态的惟一标准是道德伦理的标准：“最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是最富包容性的、激发（乌托邦）想像的意识形态。”帕米拉·麦考勒姆重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观念不是中立的思想体系，而总是一些支配和服从的方式，她还回顾了雷蒙德·威廉斯和阿尔都塞的观点，把意识形态重新设想为社会生活的物质社会过程中一个普遍的、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按照麦考勒姆的看法，重要的是探究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探索可选择的历史。她说，“在寻求解决或把握实际条件时，意识形态可以打开带有解放潜力的新的结构或新的组合。”而根据 J. 希利斯·米勒的看法，意识形态恰恰是语言与自然现实的混合。他坚持认为，在新的电子信息传播的统治下，意识形态充斥着每一个社会空间，因为媒体渗透着每一个社会空间。他把麦克鲁汉的名言“媒体就是信息”重写为“媒体就是意识形态”。米勒强调说，由于不可能把现实和再现分开，不可能把自然现实与光怪陆离的创造分开，所以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实或现实。

在文化研究的争论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似乎是最富争议的术语之一。按照众所周知的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在某一特定时间地球上只能有一种

世界性的制度。他继续指出，现代性具有传统农民仍然占人口多数的特征，而后现代社会则以完成工业化和机械化及高技术来限定。罗宾斯对于后现代主义作为当前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观念持保留态度，对资本在任何时期都有一种独特文化逻辑的立场提出挑战。他说，这种假设使政治变得太过容易了。把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合并起来会产生误导，“因为最反对后现代的”——他不无讽刺地说——“是文化上的保守分子，他们支持自由市场，而又丝毫意识不到自由市场与他们的‘家庭价值’相矛盾。”对后现代主义最否定的观点似乎是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从他的观点出发，后现代主义不仅削弱它自己主张的有效性，而且会促进一种相对主义，使它不可能区分一种政治和另一种政治。德里克认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继续为人类生存而斗争，为生活和公正、为日常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和民主而斗争，这种斗争需要一些批评判断和政治选择的基本标准，但后现代主义使这样的标准失效并阻碍这种斗争。亨利·史瓦兹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他将现代性限定为欧洲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的条件和结果。他认为，没有殖民征服，就不会有欧洲的现代性。因此，现代性是1500年前后全球范围出现的事情，当时欧洲的殖民扩张开始系统地展开，从而形成了一种全球的经济，全球的政治，以及一种全球的资产阶级。把现代性看作这样一种统治和剥削的机制、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系统，现代性就限定了过去四百年的世界，而且史瓦兹坚持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切战争准则一直未被超越或取代。约翰·罗对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后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基本相同，虽然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都反而强化了它们要批判的历史现实。他觉得迫切需要研究这种思想运动如何促使那些历史现实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了。

在这些批评家当中，对反霸权力量的看法同样明显不同。德里克把当前描述为后革命时代，虽然作为革命条件的阶级差异日益深化和全球化，但不再可能有反霸权的集体行动。在德里克看来，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是“没有中心的整体，权力全球分散，在运动中变化”，而且没有“可以从外部反对这种制度的斗争的外部”。不过，德里克对替代当前事态的乌托邦的信念，使他在“新社会运动”或“根据地运动”中，能够看到由过去的革命所表现出的人类变革的力量，这些运动包括反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群体，环境主义者，生态学激进分子，地方居民，本土民族等，虽然他也相信这些计划“必须与其他地方的劳工、妇女、反种族主义力量的运动相互影响”。米勒以不同的观点谈及了反霸权问题。他把革命或反霸权力量的消解归之于不可抵御的技术力量。他赞成德里达的看法，认为电脑空间已经抹去了主客体之间、意识及其对象之间、现实和再现之间的界线，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等等的终结。他指出，在电子传播的统治下，政治已经变成了第二位的。在新的电子传播技术所引起的变化中，包含着“政治、民族或公民身份、文化、以及个人的自我、身份和归属感的改变”。米勒认为，在一个电子传播无处不在的世界上，不可能恢复或动员反霸权的力量或人类的实践。罗也看到米勒所说的新技术的后果，但他不相信技术创新完全取消了人类实践的可能。他同意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和个人领域间的传统关系。他写道，“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存在越来越多地渗透着公共话语、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而且常常采取由我们‘自由’选择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种新的电子传播技术“主要与第一世界的经济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也是对传统的‘阶级斗争’和‘劳工组织’重新进行理论阐述的绝好场所”。换言之，通过对新技术采取一种辩证的观点，罗认为这种技术不仅正在破坏我们的私